

王艳红◎编著

贾道儒行的徽商

GU DAO RU XING DE HUI SHANG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艳红◎编著

贾道儒行的徽商

GUDAORUXING DE HUI SHANG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李 玲

装帧设计:任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道儒行的徽商 / 王艳红编著. — 芜湖 :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76-3029-1

I. ①贾… II. ①王… III. ①徽商—文化研究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1566号

贾道儒行的徽商

王艳红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0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h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3

字 数:17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029-1

定 价:35.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州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再加上徽州人本身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一派书香社会的景象),徽州人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徽商家庭更为突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柢。经商之余,他们有的借书书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人比比皆是。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文人陈去病说,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陈氏所言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扬州商业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扬州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取得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丰收。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徽商聚集的地区亦大体如此。

明代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称赞徽商程白庵及其子弟

喜好读书,谓其“士而商”“商而士”。一个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着实不简单。按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不要说赢得他们的青睐,就是立足于他们之间,也难免会成为嘲笑的对象。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表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因为徽商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这又推动了他们对文化领域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着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的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好儒”培育了徽商的文化自觉,给徽商带来了至少三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为其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奠定了文化基础,也为其商业经营带来了诸多便利;二是使徽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

本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徽商优秀文化精神,汲取传统徽商智慧,传播传统徽商文化价值,围绕文化自觉、爱国爱民、创业创新、



急公好义、诚信经营、积德行善、重教兴学、孝义持家、商业文化等主题,对传统徽商的“贾道儒行”进行解读,力求通俗易懂,部分内容以故事形式呈现,以便增强趣味性,以飨读者。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吸收了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能于文中全部一一注明,谨此致谢。书中图片大部分为笔者拍摄照片后做适当处理的作品或铅笔手绘作品,少量图片来源于网络,因无从查考原创者,故其出处未予注明,在此我们也深表感谢。安徽师范大学秦宗财、杨礼玉、田超、刘力等同志参与本书部分内容的撰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定乾先生审润文字,在此对上述诸位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7年2月

目 录

徽商好儒的文化精神	001
好儒与徽商文化自觉	006
筑城抗倭的徽商阮弼	010
开发屯溪首商程维宗	014
助推淳安发展的徽商	022
小本起家的徽商创业	026
徽商的自主创业精神	030
徽商囤积居奇谋大利	034
小算盘成就大科学家	038
徽商急公好义助乡间	044
徽商乐善好施惠桑梓	047
徽商父女贤达服侍郎	050
捐金保民的文德先生	061
笃守“善者生财”的徽商	067
秉礼和气生财的徽商	074
“善为宝”与“仁是安”	078
以义为利的市场营销	084



颇具特色的徽商广告	088
辅主经商的徽州义奴	093
显灵助商的海神传说	099
联袂经商的慈父孝子	106
轻财好义为乡邻的徽商	113
行侠仗义保家国的徽商	118
文墨相交的道昆与于鲁	122
创业与守成的徽商	127
“惠而不费”的徽商	132
孝亲持家的徽商贤内助	136
好义守信的徽州朝奉	139
书商吴勉学的出版成就	148
酷爱刻书的徽商“二马”	154
善编奇书的书商张潮	159
徽州书商的版权保护	165
秉持匠心的徽州刻工	168
促进出版传播的徽商	175
徽州布商品牌塑造记	179
徽州药商的营销文化	184
胡庆余堂的管理文化	187
胡开文墨店产品创新	191
蒙冤徽商智断无头案	195

徽商好儒的文化精神

徽州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再加上徽州人本身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一派书香社会的景象),徽州人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徽商家庭更为突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柢。经商之余,徽商有的借书书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人比比皆是。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文人陈去病说,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陈氏所说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扬州商业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扬州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取得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丰收。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徽商聚集的地区亦大体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此情况。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的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程氏家族深谙



经营之道,如盐业、竹木、珠玑、犀象、玳瑁、果浆、棉布以至于挑担贩卖浆脂,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以程白庵为代表。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通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族人来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他日益成熟,言谈之处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更吸引人的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无论是工商百姓,还是官僚士大夫,他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的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他又是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当时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与程白庵的交情非同一般。在程白庵八十大寿之时,程白庵请归有光为之作寿序。归有光欣然为序,其中一段大意是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世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着实不简单。由此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按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不要说赢得他们的青睐,就是立足于他们之间,也难免会成为嘲笑的对象。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的徽

商不胜枚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表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因为徽商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这又推动了他们对文学艺术、人文历史等领域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着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的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三百余年,影响远及海外,创造了商界神话。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它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结合学术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将“徽商精神”的内涵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叶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与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



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观测市场,观察市场导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细分,进而选择所经销的商品,还要根据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在五大行业(盐、粮食、木材、茶、典业)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的竞争时,他们能够走在同行的前面,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徽商的和谐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而且表现在一个个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他们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数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已经富有,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起家时的艰苦朴素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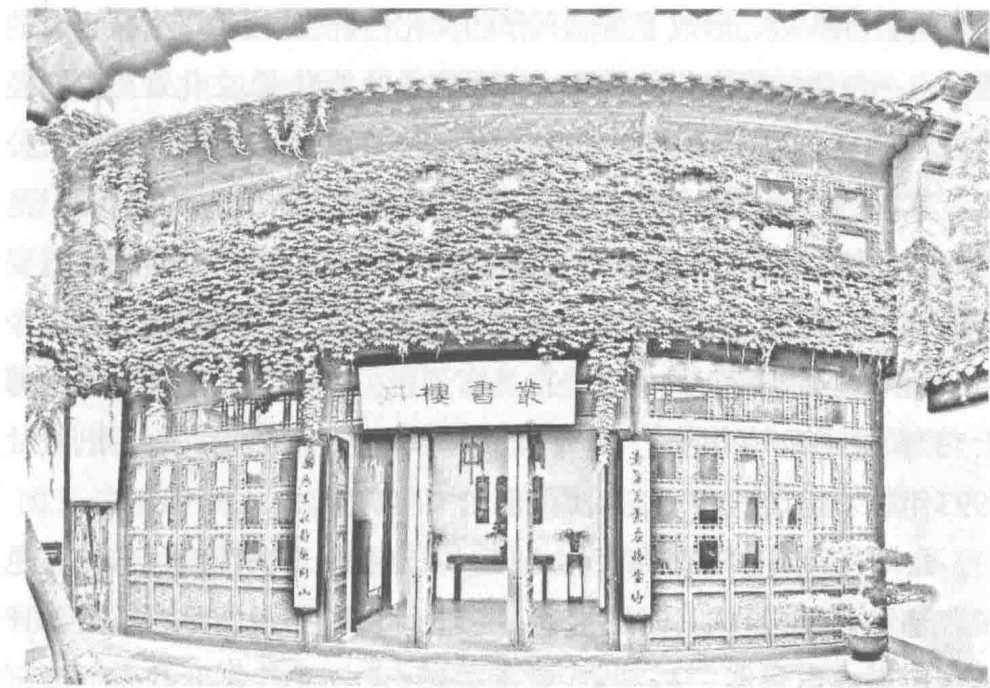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他们已经发财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他们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得到了高度发扬。

其七,读书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



“好儒”培育了徽商的文化自觉,给徽商带来了至少三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为其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奠定了文化基础,也为其商业经营带来了诸多便利;二是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盐商黄至筠的丛书楼

好儒与徽商文化自觉

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正是其文化自觉的表现。在“好儒”的驱动下,他们积极参与或投资文化事业。

徽州文化生态培育了徽商的文化自觉。首先,徽州深受宋明儒学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儒兴学的文化传统,这使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自小便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宋明儒学的处世观、文化观是徽商经营处世和文化教育的理论来源。徽商的文化素养也得到了世人公认。其次,徽商好儒,他们自觉地投入到各种文化活动中去。图书是他们的酷好之一,无论是读书还是刻书,都是他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黄宾虹说:“歙县自宋、元、明迄咸同之乱……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通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黄宾虹论画录》,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儒”的追求,培育了他们的文化自觉。

徽刻兴盛助推了徽商好儒之风。徽刻版本以高质量的印制特色闻名于世,向来为藏书家所推崇,隆庆、万历时图书品论家胡应麟评论各地刻本质量云:“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因而徽刻版本也是藏书家收藏的重要对象,徽商图书收藏家也不例外。徽刻的兴盛无疑助长了徽商藏书的风气,同时也促进了徽商创作文本,



并刊刻传世。明清时期徽商留下了众多文本作品(李斗《扬州画舫录》、许承尧《歙事闲谭》中都介绍了大量的徽商著述),这与徽刻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商业书的传播加强了徽商商业文化的传承。商业书是明清时期文献著述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传统图书中出现的新品种,更是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明清时期徽商为商业书的出版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经商之余,纷纷从事商业书的著述和出版活动。徽州坊刻刊刻有不少商业文化教育的启蒙读物,如《为商十要》《生意蒙训俚语十则》《买卖机关》《便蒙习论》《日平常》等。在《生意蒙训俚语十则》这本书中,徽商总结了十条营商的要领,内容包括勤谨、诚实、和谦、忍耐、通变、俭朴、知义礼、有主宰、重身惜命和不忘本。“而徽州民间辗转传抄的一些启蒙读物,在徽州人的孩提时代,即向他们灌输了诸多商业知识和商业道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视作初级的商人书、商业书,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王振忠《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商业书作为启蒙教材,无疑对徽商整体及其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徽州重教兴学之风培育了徽商及其子弟的文化自觉,一些徽商致富后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如徽商后人郑庆祐编刻《扬州休园志》,岳团升在该书《序》中说明郑庆祐编刻休园志的首要目的在于将先人的功绩记载下来,以供后人瞻仰、警醒。岳团升进而对商人的两种传承状况作比较,一种是致富后追求享乐型,“当明承平日久,故家大族多占地为园亭,以自娱乐……不数年亦复声渐影灭,莫可踪迹”,即穷奢极侈,富贵必不长久;一种是立言于世,嘉惠士林,“何尝不著为故事,传美艺林”,即著述立传,其意义则更加深远。郑庆祐显然属于后者。岳团升在《序》中将郑庆祐与其他富商子弟的生活旨趣做了对比,显然郑庆祐秉承了父辈创业守



家的精神,并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故能继承先业,以启后人。

明清时期徽州多宗族大姓,地缘、血缘关系浓厚,为强化宗族教育,乡族刻书、刻谱风气长盛不衰,宗族文化在宗族内部的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姓氏族谱,乡邦名士的文集、作品等成为宗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尤其是宗族谱牒,明清时期徽州人尊奉朱子理学,朱子治家思想在徽州宗族谱牒中俯拾皆是,朱子理学与宗族家法族规紧密结合,对徽州宗族的维系与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子理学通过谱牒等途径在徽州得以广泛传播,徽州宗族家法族规与朱子理学紧密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一方面实现了对宗族的有效治理,对族人具有具体明确的规范,对某些行为(如闲游、迷信、赌博、奸淫、破坏林木)有严厉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巩固和深化了朱子理学在徽州的地位。朱子理学在徽州的影响力实际上介于学术和宗教之间。乡土文化、宗族教化、宗人学术思想在宗族内部得到代代传承,形成了宗族的文化自觉。这种宗族的文化自觉对人际和谐、乡村治理、社会稳定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徽商好儒,其实质是一种文化自觉。今天看来,这种文化自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儒家的经世智慧促进了徽商的成长;另一方面,儒家伦理规范又引导着徽商向传统社会秩序回归。在传统儒家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大部分徽商在其成熟期之后,“自觉”陷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窠臼,无法逾越传统一步,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传统秩序,思想趋向保守。尤其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在这种新形势下,徽商未能接受新的文化,仍然固守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形势认识不清,未能把握大好机遇,在经营体制、经营机制、经营方向等方面不能主动改革调整,最终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逐步走向衰落。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自觉是商人应有的品格,文化自觉是对进步文化的一种认识和感悟。有了文化自觉尤其是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自觉,就具有了理性,就有了文化竞争力,企业就能顺利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商人如果缺失文化自觉,就会认不清形势,把握不住机遇,不能与时俱进,最终必然落伍。徽商、晋商这两个明清时期最大商帮衰落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文化自觉是商人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而文化迷失则是商人乃至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根源。历史告诉我们,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培育广大从业者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自觉。



清代徽州私塾耕读堂(彩陶,芜湖徽商博物馆陈列品)